

校内使用
注意保存

总第 49-50 期
2011 年第 3-4 期

学习与思考

●编者按

●奋进为人民——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解读

之一：历史最具说服力

之二：“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

之三：警醒中更好前行

之四：群众利益始终最重要

之五：中国改革的新前景

之六：“三个没有变”的国情现实

之七：中国式民主的关键

之八：努力实现可持续的稳定

之九：青春的党与党的青春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习近平

●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

——李源潮

长安大学 党委宣传部编

2011 年 9 月

编者按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深刻论述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对我们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七一”讲话动员全党同志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90 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大力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远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不负人民重托，始终坚持继往开来、不懈奋斗，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美好未来，为我们这个在 13 亿人口的东方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有着 80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不断争取新的更大的光荣。

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要全面、准确地把握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我们党 90 年来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的“三件大事”，始终坚定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深刻认识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奋斗成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坚定自觉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刻认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四个坚持”的根本要求，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蓬勃活力，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考验，居安思危、坚定信心，加强党性锻炼，加强作风养成，经受住“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深刻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五个必须”的基本要求，倍加珍惜和充分运用党的建设历史经验，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党的建设；深刻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个坚定不移”的大政方针，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

学习“七一”讲话，要紧密切联系“十二五”时期的目标任务和本职工作，牢牢把握、深刻理解讲话的精神实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今年8月15日出版的《瞭望》周刊发表解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特别报道《奋进为人民》。特别报道一组9篇文章，分别采访9位专家，深入解读了党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历史进程和“四个选择”的历史结论；“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个制度”的深刻内涵；党建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中国改革的新前景；“三个没有变”的国情现实；中国式民主的关键；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加强党的青年工作等。为了帮助全校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特将该文进行转载。

奋进为人民

——解读胡锦涛“七一”讲话精神

一篇“七一”讲话，浓缩了中国共产党90年征程，有光荣，有挫折；指明了百年乃至更长远的大计，有梦想，有路径。

“三件大事”，“四个选择”，“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个制度”，“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四个保持”，“三个没有变”由这些系统整理的论断，可读出成竹之在胸。

翻阅中国共产党90年血与火、钢与铁的历史，有时令人掩卷长叹，更主要的是一部奋进史，浩然之气溢满这片东方大地。遥想当年，亿万工农，各界精英，把对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热爱与希冀，倾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集结到她擎起的旗帜下，从救亡图存，走向崛起复兴。

然而，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只是庸人所为。不管过去有多么辉煌，当下有多大政绩，也不能一劳永逸。

归根到底，在中华大地上，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秉行人民的意志，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引领人民，继续造就不世之功。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所明言，面向未来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对如今一代共产党人而言，这恰是再续理想、告慰先辈的机遇。催人前行的号角已经吹响，执政为人民的新长征，就从新的历史起点开始，它将是比二万五千里更漫长的路程。

历史最具说服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瑞丰

历史和人民所作的“四个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成就了党和人民为之奋斗的“三件大事”，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节点，总书记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不可少。但回顾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给自己歌功颂德”，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而是通过历史，恰如其分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和地位，抑或说是，执政的合法性。”

在“七一”讲话中，胡锦涛把党的90年历史归纳为“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件大事”的推进和完成，则是“四个选择”的进程——“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历史的回顾，尽管最具有说服力，但也仅是确立起一整套逻辑的最初起点。“中国共产党要得到老百姓的进一步认同，还需依靠更多现实表现，展露更多出色的执政成就”，谢春涛说。

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瞭望》：“七一”讲话简明扼要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归纳成“三件大事”，如何理解？

谢春涛：用“三件大事”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展现了党对这个民族、国家的贡献，准确，全面，也很有说服力。简而言之，三件大事就是中国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

“三件大事”符合历史本来面目，而历史本身最具有说服力。90年的历史

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是因为它真正赢得了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

在领导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真诚地解决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民生问题，努力地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党、政府和军队保持高度廉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又取得了多方面的执政成就：政治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经济上，恢复了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外交上，荡涤了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国防上，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这几个方面的努力及成就，表明了新中国“新”在何处，也具体说明了我們通常所说的“解放”，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我们未必有深切的感受，但对于亲身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的人们，其体会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近年来，因为改革开放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农村也全面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有人认为改革否定了当年的改造。这完全是误解。当年改造建立起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改革只是对原有基本制度的丰富和完善，绝不是要否定它。

不必讳言，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也走过弯路，甚至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是，这些失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因为没有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那就不可能完全不出现失误。对这些教训的总结，为后来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深刻教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了教训。1978年，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发达国家和地区，又意识到我们的落后和原因。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从而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已经逐步展现在我们面前。

“不可避免的”选择

《瞭望》：完成这“三件大事”的进程中，得出“四个选择”的结论，分别具有怎样的历史必然性？

谢春涛：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么多政党、这么多政治力量都进行了尝试，谁也没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真正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一百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相继不断地向外界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曾先后有过两三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在刚成立时，往往都宣称救国救民，但绝大多数很快烟消云散。

举个例子来说，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 and 民力。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所选出了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都选择留在大陆。

为什么这些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精英会选择留在大陆？学者季羨林曾在晚年回忆：“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可以说接触过几乎所有的学说，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的问题。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成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不少至今还没取得过革命胜利。而邓小平理论经过丰富发展，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的提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历史充分证明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正确性。

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很可能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甚至失去已经争得的政治独立。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为此，胡乔木曾说，就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备多大程度的灵活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选择改革开放？由于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发展滞后，老百姓生活没有实质性改变。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几乎没涨过工资，许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穷则思变”，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1984年10月1日的35周年国庆大典上，游行人群中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一句最简单的问候发自肺腑，映射出当时人民对于改革的拥护与支持。

而在后来的苏东剧变之时，中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坚持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邓小平曾就此总结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

《瞭望》：历史作出了选择，但为何要不断强调继续坚持“四个选择”？

有何现实针对性？

谢春涛：回顾历史已经可以看出，“四个选择”的确是历史的结论，是人民的选择，而不是自吹自擂。但在今天，还有一些人不见得心甘情愿接受这一结论，不一一认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些人未必有多大影响，但客观上是存在的。因此，党中央不断强调坚持“四个选择”，不断通过历史来说服、教育全党和人民，目的就是增强大家的认同。

而且，胡锦涛总书记提醒全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光从历史上认同还不够，中国共产党要得到老百姓的进一步认同，还需依靠更多现实表现，展露更多出色的执政成就。也唯有如此，才能继续坚持“四个选择”。“七一”讲话随后以较长篇幅讲党的建设，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即是延续了这样一个逻辑。

中国共产党也深知，在前行的道路上仍有很多风险和考验。重大的基本的挑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科学发展的挑战，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发展思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社会和谐的挑战，我们要用平衡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等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的挑战，我们要使国际社会成员相信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从而赢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挑战，我们要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各民族间的真正的友爱团结；执政党建设的挑战，我们要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使党在复杂环境下保持生机活力，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挑战，并已有了有效的应对之策。如果党中央的各项主要战略部署能得到深入的贯彻落实，这些挑战和其他挑战都能成功应对。

经历过徘徊、焦虑、坚韧、突围、前行、奋进的中国共产党，正率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会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跨越各种障碍，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

“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李崇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任重道远。它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 90 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概括了 90 年来的三大成就，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的概括，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三大成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的根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和一个制度是一个整体。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求索，是制度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

要真正理解和认真贯彻落实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才能够在实践中真正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到既避免教条主义、固步自封，又不走歪路、邪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初的艰辛探索，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和发展，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作为贯穿中国共产党 90 年奋斗

史的一条红线和主线，是一脉相承、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

“两次革命”产生“两次飞跃”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相继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既指导和推进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后，党中央和江泽民、胡锦涛，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

理论创新依赖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两次飞跃”的现实基础，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中国社会制度上的革命和创新。其历史性任务，是通过人民战争，推翻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途径，是党和毛泽东通过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以及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又开创了（以“一体两翼”、“和平赎买”为主要任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我国在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上，发生了根本变革，从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时期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要“革”过时的、僵化的旧体制的“命”。即通过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以便找到一条适合国情、能够使我国较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这“两次革命”和“两次飞跃”，是贯穿党的90年奋斗历程，贯穿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的同一个历史进程的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两个密不可分的理论创新形态。其中，革命实践是现实基础和客观根据；而理论

创新则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思想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我们的党魂和国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行动指南。

与时俱进的统一体系

近 90 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及其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统一而又分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所指导和实现的社会变革，是我国新时期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第二次飞跃”的最直接的理论前提，它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方法。因此，“第一次飞跃”是“第二次飞跃”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第一次飞跃”，就没有“第二次飞跃”。

以新时期实践探索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是对“第一次飞跃”的继续和深化。其意义非常重大而深远。如果没有邓小平在“第二次飞跃”中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第一次飞跃”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逐渐丧失生机活力，就难以坚持和发展。

邓小平在“第二次飞跃”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本构架；其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先后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我们党在新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是对“第一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最直接、最切近、最关键的指导意义。同时，我们必须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只有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及其中国化的全过程，正确认识和把握“第一次飞跃”与“第二次飞跃”及其理论成

果之间客观的历史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任重道远。它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要做到“自觉推进”，就必须认真总结和坚持我们党90年来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积极而慎重地认识和坚持以下四种基本关系的统一：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的完整性的统一。过去90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探索、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等发展阶段。同时，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有其逻辑层次、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坚持党的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完整性的统一，我们才能够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和精神实质，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更好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必须坚持社会实践的基础性与科学理论的导向性的统一。社会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一切理论都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同时，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实践，也离不开正确的理论导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社会主义、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我们既要反对轻视实践、脱离国情、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也要防止轻视理论、迷信局部经验、只讲眼前实惠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坚持社会实践的基础性和科学理论的能动性和导向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原则。

第三，必须坚持理论创新的时代性与原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的统一。实践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演进。故而，只有以反映时代变化、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其本质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富于时代气息、引领社会潮流。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必须面向实践、与时俱进，

在继承和坚持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然而，一般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要慎重对待，不能轻言“突破”、“搁置”和“放弃”。这是因为其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这种“相对的稳定性”，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对立物——社会主义社会，各自都具有在其社会性质上的相对稳定性，以及该社会基本矛盾的相对稳定性。

第四，必须坚持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体性的概念而言，其中“中国特色”，就是主要用以表征和体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社会主义”，则主要是用以反映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本质、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即主要表征其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特殊国情和具体实践的历史性的统一。

对此，胡锦涛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继承毛泽东的事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是坚持这种统一的典范。

综观之，只有坚持以上四个方面关系的统一，才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能够比较自觉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更好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警醒中更好前行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俊杰 实习生夏奕

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是应对考验、化险为夷的制度屏障。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 90 周年大会上提出“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全党全国为之一震，海内外广泛解读随之而起。

“四大考验”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危险”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有鉴于此，胡锦涛指出：“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的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直言，在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种种风浪与惊险层出不穷、从未间断，在新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以新的概括和表述语言，向党发出了警号，意义重大而深远。

“对考验、危险的解读，要同实际行动，要同改革创新目标，最终要同我们百年大计目标联系起来。”叶笃初说。

为何严重预警

《瞭望》：在全球都在热议“中国奇迹”之时，党的总书记向全社会公开提党自身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为什么？是考验真的很严峻、危险真的很迫切，还是“盛世思危”，为防微杜渐，才有意识地把话说得这么严重？

叶笃初：如此光明磊落、公之于众，在我经历党内生活几十年中，确实是不多的。过去也说，其中分量和语气较重的通常只是在党内或高层干部中，这次则是直面社会，这就是党务公开、接受监督的实际行动。

这一次集中的概括很重要，过去的文件中，虽然分别也有一些表述，但是这次联系起来作统一整体的说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纸质媒体和网络中

已开始流传“几个危险”这样语言学家称之为“标数式简称”的用语。如果就实质内容而言，对此的确应说形势比较严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必须强调，这次提出危险，绝不是消极的、悲观的，而是积极的、进取的，意在更加警惕危险，努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使我们的科学发展、深化改革获得新的更大的精神动力。“安必思危，兴必虑衰”。你们说“盛世思危”，这样来讲也不为过。

希望大家注意到“七一”讲话中还鲜明地提出：要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蓬勃活力、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这“四个保持”总结了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成功经验。

《瞭望》：在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与此类似的预警有过几次？

叶笃初：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遇到并获得消解的风险是很多的。在我的记忆和查阅文献记录中，比较大的如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曾预言可能发生的大事变，即问题、困难、危险，多达17条，要求全党应对非常的困难、非常不利的情况。同时又讲，我们一定要胜利，并列出了7条有利条件，或者说是光明方面。最后的结论是会取得成功。

还有一次是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可能因为胜利而产生骄傲、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四种情绪”也是“危险”情绪，是可能导致我们党失败的情绪。

改革开放初期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阶段，邓小平也提出了若干危险，使党内有所准备、有所警醒。

可见，危险的提出就包含着化解的因素。党的几代领导人总是以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的政治目光及宏大气势，及时指出在即将到达胜利彼岸的同时也存在着危险。

《瞭望》：世界连续执政超过50年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只有三个，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已先后丧失执政地位。所谓“执政考验”，主要指什么？

叶笃初：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做

好了执政考验的准备，从思想到办法，特别是 1956 年的党的八大，是党在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很好总结、有了很大提升。党章中特别提出了作为执政党的一个原则问题，执政党应该成为人民的工具，而不是把人民作为自己的工具。“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是当然的，关心群众、服务群众也是当然的。

《瞭望》：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前说得比较多，综合来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在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化中生存、发展、崛起，今与昔、中与外，价值观、游戏规则都不太一样，这种图景可容乐观吗？当前是不是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

叶笃初：我的观点是非常乐观，且充满信心。当然，乐观不能不看到困难和风险的一面。“七一”讲话的结束语，一连说了几个“不”：“不停滞、不折腾、不为风险所惧、不被干扰所惑”，整个讲话是一篇热情洋溢、踌躇满志的阳光讲话，我们学习这篇讲话后应该要把奋斗精神提起来。

现在正是重要的关键时期，关键时刻。说得近一点，是完成“十二五”规划，说得远一点，建党 100 周年时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时间已经不多了。再往远处说，建国 100 周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百年大计”，今后五年乃至十年中，至关重要，所以到了关键的节点是肯定的。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无疑的，而发展、改革、创新任务很重，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做。比较而言，较多是在一些具体制度、体制方面，例如我们正在努力的，而且还要下功夫的有关文化建设及其体制等问题。总而言之，改革继续深化，发展不能停步，还是要解放思想，还是要敢于创新，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亮堂，更富有活力。

如何化险为夷

《瞭望》：精神懈怠是思想层面上的问题，为什么作为第一个危险提出？是最大的危险吗？如何应对？

叶笃初：在一定意义上是个思想层面或精神层面的问题，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大量的实际问题、工作问题，是活生生、一个个的具体事情和困难问题。

从次序排列上，精神懈怠危险位列第一，它确实是第一危险。因为思想是源头，是根本。“诚于中，形于外”。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有什么样的实际表现。重视精神力量、重视精神状态，历来是我们党的传统。

常常说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在一定意义上，精神状态有决定性的作用。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内涵很广泛，大至信念动摇，小至无精打采，做事提不起精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老好人”，等等，精神垮掉了，一切就无从谈起。共产党最重视精神的原动力作用，红军长征时期，那样的困难环境，靠的就是精神。抗战时期，我们有些根据地很困难，延安的物资也非常匮乏，也是靠团结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很多困难。改革开放，科学发展，都需要精神动力、精神支持、精神巩固。

《瞭望》：“能力不足”主要指哪些能力？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党员、干部，是否应有不同的能力要求？

叶笃初：对我们党来说，主要是指广义上的执政能力。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作过一个科学概括，就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以后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党在其他具体场合、具体问题上，还强调过处理灾难、安全事故以及防止突发事件的能力，节约资源、加强环保工作的能力，等等。能力的内涵是不断提升、不断丰富的，能力也处在动态和发展中。

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工作、不同职业，确实应有不同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我比较重视的是群体的能力。个人能力主要靠个人，集体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组织的养成、指导和推动。现在身担重任的“60后”、“70后”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起着重要历史传承作用。新一代的干部群体，人们称“80后”，也要准备有接班的能力。历史上邓小平、陈云同志提出了老干部要学会带新干部，这也是一种能力。新一代干部也要善于向老干部学习，学习他们调查研究，学习他们深入基层，学会这一套也是科学发展的能力。

《瞭望》：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取得成功的法宝之一，如今执政的情况下，如何去代表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

叶笃初：我们党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时按照党章规定，履行党的宗旨，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实际生活中，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样，比较而言，现在当然要更多注意照顾、关怀那些弱势群体，例如贫困地区和进城的农民工等等。根本利益很重要，但鉴于社会状况还在发展中，有一些地区或群体需要更多的现实关怀，解决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党在这方面还需要不断地下功夫，做得更实、更好。

《瞭望》：领导干部下基层视察、慰问，接访、下访，多与群众直接打交道，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了吗？如何保证领导干部心里真正装着群众、为群众服务？

叶笃初：密切联系群众，要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到基层去，用群众说的话，是要多接“地气”，这显然是第一位的。要说是联系群众，不打通这个通道，一切都无从谈起。

干部心里真正装着群众，为群众服务，首先当然是靠自觉，靠培养感情，同时也要制度约束。现在许多地方都有规定，对各级干部都有不同的联系群众的要求。我知道国务院一个部级单位正在有计划地派一百、几百位年轻干部进入村里，特别是经济发展比较差的、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的地区，派一批干部住在那里，建立长期联系与帮扶，每个干部在那里听群众呼声、要求和建议。这种做法是值得仿效的。

在联系群众这方面，我想新生代的干部要更加努力一些，脚踏实地练出这一种硬功夫。

《瞭望》：如何判断当前的反腐形势？反腐倡廉工作力度很大，为何贪官仍层出不穷，且窝案频发？

叶笃初：这的确使党内外都感到有一些揪心。权威性判断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态势，可说是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的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由此，我们需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有人说反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有些国家情况相对好些，但有许多比较糟糕的。不是世界上也有个什么排行榜吗？我相信我们会较快地好起来。

《瞭望》：总的来说，如何才能有效应对考验，化险为夷？

叶笃初：应对这些考验和危险，都需要持久地作出努力，这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部分。希望不要出现曲折，更不能停滞和后退。经过 90 年的磨炼，中国共产党既有强大的思想精神力量，又有强大的组织聚合力量，现在正在努力筑成强大的制度约束力量，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世界环境下应对考验，化险为夷的三个重要力量。

群众利益始终最重要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实习生夏奕

我们党能不能战胜风险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关键就在于党能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拜人民为师”、“把群众当亲人”在“七一”讲话中，胡锦涛用生动和充满感情的语言再次强调，“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在这篇一万四千多字的纲领性讲话中，“人民”是关键词，先后出现了136次。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在90年历程中完成和继续进行的三件大事，集中到一点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因如此，无论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或是党在克服自身错误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都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拥护和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三个关切

“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快速转型之中，随着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的变动，人们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群众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龚维斌认为，历经90年的发展，在新的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拥有比以往更多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但是也面临新的更大的挑战与考验。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回顾90年的历程，龚维斌说，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将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之如鱼水，喻之为血肉，视之为种子与土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就，都是通过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

龚维斌认为，作为执政党，唯有代表、反映、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只有紧紧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才能真正拥有长期稳固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力量。

而群众当中则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正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因势利导，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将群众不断探索产生的基层经验加以总结提升，加以完善和推广，最后形成政策和制度。“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关键就在执政党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龚维斌分析，面对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对着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多样化以及信息化带来的冲击，群众基础和党的自身队伍都在发生着变化。此时，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谁是群众。“群众”一词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我们党比较习惯的用语，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群众”是由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组成的。比如，从生活水平上来看，有较为富裕的群众，有刚过温饱线的群众，还有比较困难的群众；从城乡区域看来，有农村的居民群众，也有城市的居民群众；从所有制来看，有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群众，还有在非公有制经济、新兴产业就业的群众。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首次使用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提法，并将之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既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也属于“群众”的范畴。因此，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就要善于发现群众在哪里，谁是群众。

第二，群众在想什么，群众有什么诉求。在新时期，群众诉求各有不同，因为其生活地域、阶层、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不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群众的要求也不一样。特别是在民主法制时代，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显著增强，这都要求我们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群众的诉求，否则，群众工作就可能缺乏针对性、时效性、准确性。

第三，怎样倾听群众的呼声，怎样反映群众的诉求，怎样了解群众的心理和情绪。由于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化，如何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收集最有效的信息，这也对党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提出新的挑战。

“如果我们不能创新理念、创新工作方法，就有可能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容易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损害。”龚维斌强调说。

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

“在改革开放纵深推进、攻坚克难的过程中，群众的要求表现为多样化、差异化，各种利益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真正做到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问计于民，问政于民，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政策能否满足群众的要求，执政党能否真正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龚维斌说，群众工作“倒逼”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改革魄力与能力，考验着党风廉政建设。

“七一”讲话将“脱离群众的危险”摆在突出位置，敲响了警钟。龚维斌认为，应该看到，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的方式方法和理念上仍然存在一些偏差，与群众的需求尚有距离。比如，有的干部面临精神松懈的危险，不善于做群众工作，有的干部自身素质跟不上时代变化，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意识欠缺，易因处置不当，造成党群关系紧张，官民关系的不和谐，直接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损害的党执政地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他分析说，从当前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种表现：其一，因长期执政，某些领导干部的权力主体意识出现错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替民做主的思想比较严重，总以精英自居，做决策、想问题不愿倾听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诉求。

其二，某些干部个人作风出现问题，对普通群众的要求充耳不闻，或者轻描淡写，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却热衷于交往大款、大腕，出入灯红酒绿的场所，其定政策、作决策，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基层群众的合理要求，可能只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要求，甚至于满足个人私利，扭曲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三，有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害怕群众，不敢与群众打交道，不愿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做调查研究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此外，还有的干部在与群众接触过程中，不善于从群众角度思考问题，不善于用群众的语言进行对话，一说话就是首长腔，一提问就像审判官，居高临下；面对矛盾纠纷，不善于调解，仍以行政权力管卡压等传统手段为主，简单

粗暴。

龚维斌指出，当前能否做好群众工作是对执政党的重要考验。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格局里抓住主流和支流，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区分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善于既着眼长远和全局，又善于统筹兼顾、妥善协调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在价值观念多样化、新媒体日益开放的格局下，牢记宗旨和使命，要求党员干部提升能力和素质，特别是要提升做好基层群众工作的能力，学会与群众打交道。

把群众当亲人

“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龚维斌说，“七一”讲话中的这句话既朴素又深刻，令人深受教育和震撼。

他认为，要提高群众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做到“把群众当亲人”，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心中时时想着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领导干部要像一些地方信访干部那样，“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来访当家事、把来访群众当家人”，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开展工作。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工作好坏的标准和依据。

其次，各级领导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领导干部要真正沉下去，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了解群众的疾苦和情绪。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最近几年，各地创新了一些“双建双带”、“三进三同”、“结穷亲”等活动，都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些有益举措。

再有，各级领导干部要拜人民为师，加强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借助群众的力量，破解发展的难题，协调利益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还要加强对各级干部的培训，努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和能力。要改革和完善对干部的考核办法，例如，增加对党员干部到基层调研次数、接待群众上访次数等指标，促使干部眼睛向下，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好权力的来源问题。”龚维斌认为，必须明确的是，党员干部要清醒意识到，手中的权力来源于群众，“如果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福祉，人民群众就会把他们的权力拿走。”正因如此，他建议，在干部选举、选拔、任用方面，要更多地增加民意的成分，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少数干部可能就会认为他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组织部门，就会眼睛向上，而不是扑下身子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解决好权力的来源问题，与权力的监督和约束的问题，对于做好群众工作，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此外，龚维斌认为，还需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做好群众工作搭建平台和载体，鼓励、支持和选派优秀人才到基层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成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驿站。

中国改革的新前景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

“躲不开、绕不过”反映了中央直面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也反映了当前改革的艰巨性和紧迫性。现阶段最艰巨的改革任务就是要消除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拿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读本，向东一字一句地为《瞭望》新闻周刊读着胡锦涛总书记的最新论断。“躲不开、绕不过”显然给他留有深刻印象，反复念了两遍。

8月5日，作为改革政策研究领域知名专家，从当前中国改革的全局角度，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长向东以学者的身份向本刊记者解读了自己对“七一”讲话的研究体会，“中国多年来实行渐进式改革，容易改的已经基本上都改了，下一步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阶段。”

按照他的理解，所谓攻坚克难，就是改革要打破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不合时宜的既定利益格局，因此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躲不开、绕不过’是当前改革的典型特征。”

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100年”，即在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向东看来，实现这两大奋斗目标，既要加快发展，更要加快推进改革进程。

“现今，人民群众的思想很活跃，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过更美好的生活有许多新的期待。”为此，向东强调，作为人民政府，必须顺应民意，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反过来说，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改革的主要内容。”

“要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新台阶，仍要依靠改革开放。这是中国深化改

革所赖以继且难能可贵的全民共识。”每思考到此，向东说自己就会想到小平改革之初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亡党亡国。”

“这话到今天提起，仍然让人激动，仍然让人产生要向前推进改革的动力和热情。”他动情地说。

新时期改革特点

“七一”讲话中强调，“我国过去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从通过总结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五大举世瞩目成就，解释了这个判断的深刻内涵：

一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二是生产力发展从缓慢走向快速、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三是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走向总体小康、从贫穷走向富裕，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四是社会事业发展从严重不足到全面进步、从较低水平到较高水平，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五是社会主义制度从不完善走向完善、从缺少活力走向充满生机活力，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目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建立和完善为目标模式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探索起步阶段，和党的十四大到本世纪初的框架构建阶段。以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为标志，进入了体制完善阶段。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巡视员宋葛龙认为，新阶段的改革呈现出全新的特征。

其一，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协调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四项改革如何协调推进，如何安排好改革的重点、优先次序、改革的力度，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

其二，改革已向全面改革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着力破除旧体制，改革开放中期新旧体制交替。现在，则进入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2020 年要

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十年时间。

其三，改革从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为重点，向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实质是要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今天，显然不能以此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必须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统筹地方与中央、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复杂关系，推动更为深刻的体制调整和制度建设。

其四，从建立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为重点，向建立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主要着眼于促快、增多，在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数量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只有把改革转向求好向高，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协调发展，才能争创发展的新优势。

其五，从增强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向全面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转变。新时期、新阶段不仅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要进一步理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正确理解政府的职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空缺，克服市场调节的偏差，应对市场失灵，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体现公平、注重均衡，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的作用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改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针对新阶段的改革深化，“七一”讲话给出了明确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在向东看来，必须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而当前改革的顶层设计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时期最艰巨的改革，主要就是发展模式的转型。

2010年，中国实现了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但与欧美日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综合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差距还非常大。”他举例说，按照IMF2010年数据，中国去年人均GDP位于世界第94位，仅相当于日本人均GDP的1/10；改革开放后我国减贫2亿多人口，但按照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

我国仍有 1.5 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资源能源难以支撑、生态环境难以承载、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仍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向东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现。

“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所谓人均收入 3000~10000 美元发展阶段，如何迈过这个坎儿？”向东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没有解决好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人民群众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过去，国家、企业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占比多一些。下一步要提高‘两个比重’富民，分配向个人这边逐步倾斜。”

这充分体现在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同政策重心上。向东介绍，1998 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大部分政策性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此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钱主要用在了改善民生上。

比如，新一轮住房改革，“十一五”期间已建设 1100 万套保障房，“十二五”还要建造 3600 万套，将基本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改革，“新农合”已经覆盖全国 95%以上。城镇居民、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再有 1~2 年就可以实现全覆盖了。今年要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覆盖率全国要达到 43%以上，现在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就将实现全覆盖。这些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改革。

然而，这种建立在重组利益格局背景下对“分蛋糕”方式的改革，使得发展转型面对巨大挑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直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为什么“久转难推”、“转而不快”，这既充分反映了转变的艰巨性，也说明没有体制改革的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主要障碍就出在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

在向东看来，正是基于对当前改革和转型的清醒认识，“七一”讲话强调，“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七一”讲话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

向东解读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国搞乱了，再来搞改革，这个代价太大了。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必须要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世界上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搞如此大的改革，肯定会存在一些曲折和阵痛，不能因此就放弃改革，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来抓发展，促改革。”

向东指出，改革要有大局意识，“我们的问题是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解决。中国的改革经验是渐进式，不能搞休克式。否则最后伤害的是老百姓。所以，要在稳定的大环境中搞改革，如果中国乱了，一切免谈”。

“当然，既要积极推进改革，也要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力度，把握好老百姓的承受力。”他引述总书记就发展提出的忠告：“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并解释说，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现在要更多地让大家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就要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好分配问题。”

他总结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稳定是前提，发展是主轴，改革是动力。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在稳定的大前提下加快发展，实现长期健康持续发展。”

同时，向东特别看重新时期的改革要着眼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让人民参与其中，“改革有的需要深化，有的需要完善，有的需要协调。这个过程中就要充分发动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从中受益。要明确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党和政府在改革中的动力是什么，调动每个人、各行各业、每个阶层的积极性。那种脱离群众、关起门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个没有变”的国情现实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 韩保江

“三个没有变”，告诫我们不要陶醉于已有成就，不要为杂音所困扰，不要放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地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彻底告别贫困和温饱，正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崭新阶段。也正是由于我们所取得的如此骄人的成就，世人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称为“中国模式”，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誉为“中国奇迹”。

然而，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却告诫我们，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三个没有变”让人警醒

这“三个没有变”振聋发聩，让人警醒。

讲“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指我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尽管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但不尽完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阻碍和桎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建立合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任何急于求成的社会制度变革都是有害的。

讲“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没有变”，是讲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不足仍是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唯一出路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不断做大财富蛋糕。

讲“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则是指尽管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经济总量去年仍然排在世界第 94 位。虽然我国减贫

成就巨大，居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但按国家统计局 2010 年数据，我国仍有 1.5 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消灭贫困仍然任重道远。

“三个没有变”的告诫，让我们不要陶醉于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要看到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让我们不要为国际国内各种批评中国的言论所困扰，紧紧扭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关键，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快改革和调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中心漂移”，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进一步筑牢国家发展繁荣、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

根本手段仍是发展

无疑，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做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要解决好诸多的结构性问题，最根本的手段仍然是发展。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三农”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格局始终没有真正打破，优势资源和发展优势严重向城市倾斜，最终导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社会资本剪刀差、人力资本剪刀差和土地收益剪刀差等“不等价交换”趋势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越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的“补贴悖论”。由于这种城乡“不平等”的发展格局，致使“三农”矛盾日益突出，农业安全和农村稳定形势令人担忧。

需求结构失衡，消费不足矛盾突出。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过度追求 GDP 的增长率，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加上部分官员政绩观扭曲，为保速度常常通过大量投资来追求“短平快”，久而久之忽视增加消费对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拉动效应，消费不足成为我国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民生和社会矛盾突出。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一方面表现在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企业和政府

所得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表现在国民收入(财产)在居民之间分配不平衡，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失衡的分配结构，不仅严重制约着消费需求的扩大，而且严重恶化了社会矛盾。

产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矛盾突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资本和科技投入不足，中国农业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尴尬；由于我们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尽管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但还没能成为“创造大国”；特别是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进而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效益发展的“瓶颈”。

区域经济结构失衡，中西部发展滞后的矛盾突出。从大的区域结构看，东中西部发展不协调，区域收入差距扩大；从区域内部来看，西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中部地区各省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具体到各省区市内部发展也严重不平衡，如新疆的南北疆之间、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与粤北地区、江苏的苏南和苏北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区域差距已经成为引发区域发展矛盾乃至西部民族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民生矛盾突出。分配不公、就业困难以及老百姓住房难、看病难等民生矛盾已经成为引发民众不满的诱因。这些民生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不仅会直接导致社会动荡，而且会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动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积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大趋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方针，努力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另一方面，要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努力做到“四个准确把握”：即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能否抓住和用好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不仅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

关键所在，而且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

成败在于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而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又在于彻底转变过去那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

其一，要以结构优化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优化城乡结构，彻底打破“二元经济”。在继续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同时，着力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需求结构，努力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延长服务业短板。在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动工业由大变强的同时，着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优化区域结构，努力形成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新格局。

其二，要以自主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转变发展方式本质上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要加强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培育一批技术推广机构，给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技术产业化。特别注重突破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瓶颈，开发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综合整治技术，开发资源高效勘查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其三，要以深化体制改革保障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导致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一方面，要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财政体制和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和机制。同时，还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发挥好价格杠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要加快推进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抑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杠杆作用。要建立真正反映农业生产成本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其四，要以建设“两型”社会支撑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向更高层次和更高阶段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广泛开展节约型社会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强全社会、全民族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完善法律法规，通过价格、税收等手段，鼓励和支持合理消费，引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耗产品和服务。对大排量轿车、过度包装等，要研究采取经济办法适当限制。每一个企业，都要积极开发应用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和产品，加快节能降耗技术改造，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和污染排放标准，完善和落实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

第五，以健全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保证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关键。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干部考核评价指标要体现综合性、全面性，既要注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又要注重发展的方式、质量、结构、效益；既要注重经济建设情况，又要注重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情况；既要注重已经取得的显绩，又要注重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要按照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针对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突出不同区域的考核重点；要强化对违反科学发展观行为的刚性约束，充分发挥干部考核对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

中国式民主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室主任、研究员 李正华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坚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七一”讲话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执政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是靠党自身的先进性赢得的。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理论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只有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保持先进性。90年来，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重视自身建设。

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是一个现代政党政治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不能代替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行使权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党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规范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七一”讲话明确提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国家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人民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决定。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步进行了包括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在内的各项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第一次实现了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方面，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实行基层群众自治，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大厦。把代表制民主与基层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和整体优势，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和一条重要规律。

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必须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就必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只有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才能真正树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促进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

治国理政的法治轨道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七一”讲话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只有依法治国，人民才能通过法定形式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才能通过法定程序保证国家的重大决定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才能使自己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要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法治建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公民享有同等的参与政治的资格和机会，不仅拥有积极的行为权利，可以自由地表达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人和国家应该听取与采纳的政见、决策或立法建议，可以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自主地选择行动方案，而且还享有要求他人不得妨碍公民自由的权利。

依法治国必须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尊重保障人权紧密结合起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人为本、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就逐步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法律法规，规范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后，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修改、颁布、实施的1982年宪法，成为党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随后，又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进行四次修正，取得了两大突出成果：一是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使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上升为宪法准则。二是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人权”入宪，将执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把政治原

则提升为宪法条款，作为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至此，民主、法治、人权在宪法中得以确立。

到 2010 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 236 件、行政法规 690 多件、地方性法规 8600 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关系，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从法律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以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办事，是党采用什么执政方式开展执政活动的问题，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依法治国来替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越是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党的领导就越能得到增强，党的执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障。依法治国不仅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也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努力实现可持续的稳定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瑞丰 实习生 赵鹏飞

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增进,另一方面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也能得到保障,这样的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稳定。

稳定仍是硬任务。“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再次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中央为何一再强调稳定?这是一种什么状态的稳定?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为此专访长期研究社会治理的知名学者、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

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

《瞭望》:在致力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同时,为什么中央也一再延续对稳定的强调?

何增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非常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发展改革稳定三者之间,始终是在动态变化中加以调整和平衡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稳定的根本保障。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虽然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工作的重心会有所不同,但三者都不可或缺,不能有所偏废。离开改革和发展求稳定,稳定就会失去根基,只能赢得一时的稳定。

现在强调稳定是硬任务,是为了给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一个有利的大环境。我们已经进入到现代化的中期阶段,一方面现代化高歌猛进取得很多成就,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面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挑战。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大幅度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层次和范围以及冲突的烈度都会增强,社会动荡和失序并非不可想象之事,如果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现代化大业就会遭遇严重挫折。从这个角度讲,强调稳定非常迫切,以免现代化前期取得的成就功亏一篑。在维护社会稳定上需要凝聚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

《瞭望》：要维护稳定，目前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何增科：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目前面临着多重挑战。首先面临着风险社会的挑战。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极大，传染病、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流言信息等都可能迅速转移、放大和扩散。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多样。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制度的风险、技术的风险、自然灾害引发的风险、高度流动性带来的风险，都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风险社会需要有效地防范和处理风险的机制，否则小风险可能演变成重大危机。“非典”从个别病例迅速演变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第二是信息社会带来的挑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增幅6.1%；2011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同时截至2011年3月底，中国已备案网站数量已达到382万个。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信息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网络、微博、手机等新传播方式不断更新，各种各样信息快速传播，客观上使得社会情绪很容易被鼓动起来。比如一些原本是小范围的矛盾，在信息社会很快就被放大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此外，还出现了网络的语言暴力，网络舆论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集体行动，等等。

第三是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国内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某项政策或某件事情，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那种关起门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用顾及国际社会反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虽然一些领导干部还不习惯这种局面，但却不得不去面对它。外界对我们的反应和压力，都会影响我们内部的稳定以及维稳的努力。

第四是反腐败的挑战。腐败现象仍在扩散蔓延，腐败程度仍然，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腐败现象的猖獗导致民心的流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第五是改善民生的挑战。老百姓在就业、住房、养老、医保等日常生活多方面都面临巨大压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在享受发展成果上存在失衡，很容易导致人们情绪偏激，进而触发过激行为。如果人们的生活中

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人人都存在焦虑感，这个社会也就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

追求和谐的稳定

《瞭望》：在有些人看来，稳定就是“把社会管住”、“绝不能出乱子”；也有人认为，要追求和谐的稳定、自觉的稳定、动态的稳定。中央现在强调的稳定，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稳定？至少包括哪几个方面？

何增科：社会稳定可以分为传统的静态的稳定和现代的动态的稳定。传统的静态的稳定是在强力维持思想和组织的大一统状态静止不变情况下实现的稳定。而现代动态的稳定则是在维护社会多样化和活力过程中通过动态调整实现的稳定。实现动态的稳定，需要维护社会的多样性和活力，需要让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表达，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这有利于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在复杂的、流动的、多变的现代社会中维护稳定，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动态调整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取得一种动态的均衡。

一个没有不同意见、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有矛盾，有冲突的社会中，我们要做的是善于驾驭矛盾，调解冲突，减少冲突的烈度，并使人们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反映，在此基础上，不断利用政策和法律的调整，来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使各种各样的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也就是把个体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协调起来，而不是通过牺牲其中一个来追求另外一个。

因此，我们讲的稳定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动态的稳定。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增进，另一方面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也能得到保障，不同阶层、地区之间的差异性需求都能获得充分关照，这样的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稳定。否则，不论是花钱买稳定，还是依靠强力管制维持稳定，成本都过高，都不可持续。

应该说，对如何维护稳定的看法，目前还没有形成全面的共识。要有这种意识：不能一强调稳定，一强调社会管理，就只想到要加强社会控制、管制甚至压制，这样会把社会管成死水一潭，没有活力。

《瞭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否对“维稳”思路进行了一次新破题？

何增科：社会建设和管理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

现代化本身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意味着社会的现代化，政府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本身恰恰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现代化，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破解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陷阱，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认识在深化。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意味着我们在促进经济改革之外，要更加重视社会改革。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战略机遇期。要推进社会现代化，推进政治现代化，还需要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相配套，还需要促进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

从源头上维持稳定

《瞭望》：当下社会利益分化明显，利益协调不力、诉求不畅，成为许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

何增科：第一，从一些发展经验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边增长、边分配的模式，比起先增长后分配的模式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边增长边分配，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发展中小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民营经济同样具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效果。

第二，政府与一个个单独的个人谈判成本过高，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具有反映诉求、提供服务、规范行为这三大积极作用。为此需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公民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学会通过社会组织有序地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利用社会组织进行利益表达，可以减少体制外维权和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推进制度框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信息来源和信息通道的多样化，意见表达渠道的畅通，可以畅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实现官民良性互动，从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瞭望》：国际形势，包括外部经济环境、社会运动、国际纠纷等，对国内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如何应对？

何增科：提到国际形势，主要包括两方面。一要看国际发展的大趋势，

要顺应这个趋势，才不会被历史潮流冲垮。二要看到国际社会的发展也充满了挑战，充满了风险和陷阱，怎么不陷进去，就非常重要。

这也需要处理国际事务的政治智慧，既要避免战争，又要保护自己主权，不能一味地退让，也不能一味地硬碰硬，在斗争、妥协和合作多种策略的交替运用中维护和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处理不当，会直接导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又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杀伤力。

简单来说，要应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第一方面在经济多元化的条件下，要保持对外开放，只有在开放的社会中，才能真正取得发展。

第二方面，在国际社会中，应学会与其他经济体合作处理全球事务和地区性事务。中国要在促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和区域治理的民主化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第三方面就是和平共赢。怎样顺应这种和平共赢的趋势，既要和平，同时又要共赢。这需要在制度规则安排方面多动脑筋。

青春的党与党的青春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温泉

一个善于团结青年、赢得青年支持的政党，必然是一个散发着青春气息、充满活力的政党，这样的党必将能够在以后的历史长廊中书写更多更美的青春史诗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青年的热切期望。

“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 90 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在纪念建党 90 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以专门段落再次强调党和人民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再次彰显党对青年的重视，这也是党保持勃勃生命力的内在要求。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中国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如何保持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凝聚力，党的青年工作面临怎样的新挑战？《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

信仰感召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载的风雨历程，就是一部凝结了无数青年热血的青春史诗，是党高度重视和肯定青年的地位与价值，用科学的青年观引领青年为中华民族振兴英勇奋斗的历史。”陆士桢认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主要源于精神信仰。

1937 年，33 岁的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1938 年至 1939 年，“到延安去”成为一股潮流，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坚定

立场和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成为吸引大批有志青年的关键因素。而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 90 年来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的生动写照。

陆士桢梳理道，党历来十分重视为自身注入新鲜的活力。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极大地肯定了青年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动员了青年群体。

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毛泽东评价青年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

在民主革命时期，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后备队和接班人，这成为第一代领导人思考青年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认为青年工作需要有一个富有政治远见的、成熟的、能够代表青年利益的，并能够体现青年工作崇高奋斗目标的政党来领导，这样才能保证青年工作方向的正确、政策的不失误和措施的有力。正是在这种青年观的指导下，党团结了大量青年，使广大青年和学生运动成为了人民革命的一部分。

在摸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依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在青年培养的目标、如何培养青年成才以及青年思想教育的内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青年培养的目标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生力军。青年培养的指导方针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除了要求青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同样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明确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成才标准。青年思想教育的内容从阶级斗争教育到民主与法制教育。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十分相信青年，注重对青年人才的选拔和使用。邓小平指出，选拔青年干部，实现干部的年轻化是一个重要的

迫切的战略问题。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于青年的培养的注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能力走向了科学和成熟。

在找寻如何建设党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刻关注着青年，关心着青年，指引着青年，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时代主题和青年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要思想，为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指明了方向。如，提出“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的思想。“四个统一”把青年成才与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趋势紧密联系，是指引青年沿着正确的成长之路前进的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探寻如何发展的路途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我们的党就是这样的党”。这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对青年发展问题的高度体现。同时，中央从时代的视角寄希望于青年。“希望当代青年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四个新一代”通俗易懂但分量很重，具有创新意义，既包含了党中央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青年先锋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日益多元、物质成果日益丰富、传播方式大众化趋势明显、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加快，以“80后”为代表的青年人也日益呈现出新的特征。

陆士桢分析说，比如，在享受了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他们必然也就形成了同父辈完全不一样的物质态度；在思想空前解放的宽松空气中呼吸，他们自然更加重视自我的发展，追求着父辈想也不敢想的自由和放纵；经受着快速发展的高科技的冲击，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敏捷、蔑视权威、崇尚创新。在他们身上，先进与激进、批判与反叛、生命力和破坏力共存。

不过，应该看到，青年的本质是生命力和创新性，活跃并富有创造性的青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开路先锋，是解放思想的生力军。“青年不仅是基础，是未来，更是现在。他们必然是先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力量，也一定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陆士桢说，一批青年在当今高新科技领域和新经济组织中做出的突出成就和贡献，集中表现了青年与先进生产力的天然联系；而青年人在汶川地震、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关系国家利益与发展的大事件中的积极表现，更是清楚地表明，青年与社会变迁共成长，青年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最活跃的力量。

青年何以被称为先锋？她具体分析，首先，观念优势、知识优势和创新优势，这三大优势，使青年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生力军。以高新科技领域为例，IT业的“少帅”现象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证明。IT企业的主要经营者、管理者或创办者，大都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有的就是典型的“80后”。

其次，青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和依靠的力量，是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最积极的参与者。青年在社会变迁中的活跃状态，是其思想解放的社会性基础，也是青年发挥先锋作用的形式和载体。

一方面，青年是社会流动的主力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底发布的《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的规模也急剧增长，2005年已达14686人，其中，14~35岁青年占52.0%。在跨省流动人口中，青年人是主力军，按14~35岁计算，达65.5%。在青年社会流动中，占份额最大的就是青年农民工的流动。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回乡后，又给农村带去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推动着城乡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另一方面，青年创业是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我国参与创业人员主要集中于25~44岁之间，青年成为创业活动的主体；而年龄在29~34岁的青年尤为积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比较成熟，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也比较强。

再有，青年文化引领社会风气之先。在进步发展的社会和时代，青年文化

与先进文化方向一致，担负着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社会重任。今天，青年依然站在时代文化的潮头，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敏感地捕捉国内外社会文化的最新动向，推动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创造条件鼓励青年成长

在看到青年一代给社会建设带来的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陆士桢认为，也不能忽略青年的个体性、社会化参与也给青年自身发展、给青年教育、给社会青年事务的管理、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其一，社会参与的个体性、社会性特征给青年的社会行为选择带来了挑战。对青年来说，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扩大了信息含量，资讯的迅猛令其价值判断应接不暇；价值的多元也会给他们的社会行为带来误导；而青年亚文化鲜明的群体性和符号性特征，也会令相当部分的青年易受社会文化潮流的裹挟，做出非理性甚至破坏性的社会行为。这给青年自身的成长和青年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其二，如何学会在法律框架下自由、理性、充分地表达民主意愿；学会通过合法、有效的渠道参与社会管理；学会依法表达作为社会个体的各种合理诉求，绝非一日之功。随着社会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青年学习社会参与的任务依然艰巨。

其三，一些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对社会事态的控制，对青年社会行为的控制。原有的干预、介入的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不仅需要进一步改革日常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道德教育，也需要以新的思想和观念处置社会群体性事件和青年社会事务。

客观来看，当前的青年工作尚有薄弱之处。陆士桢说，在我国，政府部门中尚缺乏专门管理青年事务的机构，政府的青年事务被委托给共青团，共青团属于群团组织，其处于党委序列当中，不具备行政能力和属性。政府青年事务涉及青年和青年工作法律、政策的研究制定，青年福利服务机制的建立，青年事务的财政支持、青年组织及服务机构的管理等内容，对此，共青团尚缺乏相

应的法律地位和清晰的授权，没有调动资源的能力，很难有效解决涉及青年利益的根本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专门设立青年事务的管理、协调、服务机构，其类型有四：政府成立专门的青年事务管理部门；将相关部门合署办公；建立政府总统府(总理府)内设的专门机构，如日本的青年对策本部；设立青年事务委员会，由多个部门参与。

此外，传统的青年工作中的两个倾向也需要加以调整。一是在青年政策上，政治取向大于福利取向。国际上往往将青年视为正在发展中的人，并给予各种福利政策加以帮助。但在中国，通常将青年视为“接班人”，对如何满足青年的福利需求考虑不足。二是在青年工作上，教育取向大于服务取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共青团在服务青年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但距离青年的需求仍有距离。

陆士桢提出，在新时期，党要赢得青年，首先，应当完善管理青年事务的专门机构和组织。她建议，在国务院序列中增设青少年儿童局，专门负责青少年事务。同时，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应成为连接党和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巩固党在青年中的执政基础，推进青年政治社会化；作为青年的群众组织，应当代表青年利益，竭诚为青年服务。

其次，切实解决涉及青年自身利益和发展的问題，不能让年轻人“心里有火”。比如，应当重视青年的收入和住房问题。并采取积极措施，鼓励青年人创业发展。

同时，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要依靠社会提供平台，但更需要青年自身的清醒与努力。青年人要戒掉好高骛远的骄气，戒掉郁郁不得志的怨气，戒掉唯利是图的俗气，敢想敢为，努力做时代的“弄潮儿”；也要永远坚持人民利益方向，努力实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更要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做“草根英雄”，若脱离“草根”，青年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难以成就有价值的人生。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习近平

中央党校 2011 年秋季学期今天正式开学了。我代表中央党校校委，向全体学员表示热烈欢迎。

同志们放下繁忙的工作来到中央党校，主要任务是学习。重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要学习做好工作需要的其他知识，包括历史知识。今天，我主要就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谈一些体会和认识，和大家交流。

一、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求学时期就曾说过：读史，是智慧的事。就是说：你要增加智慧吗？史书是不可不读的。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一贯倡导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要善于运用历史知识。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44 年，在中国革命迅速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他高度评价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在解放区重印这篇文章，目的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学习历史的号召，强调要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特别要了解和懂得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学习历史和借鉴历史经验。他把了解和懂得历史看

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明确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反复强调“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全党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为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江泽民同志同样高度重视历史和历史经验的学习与运用，多次强调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读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对重视学习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他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回顾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这是我们党90年来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领导干部读点历史，有助于提高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修养，有助于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历史记述了前人积累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记述了他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与智慧，记述了他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学习和了解这些历史上的文化知识、思想智慧、经验教训，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结合领导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或者吸取应用，或者作为借鉴，或者引为警戒，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改

进我们的工作，是会大有帮助的。我们的领导工作综合性、系统性强，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多方面知识，其中历史知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基本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知识和基本的文化知识、工作经验都是具备的，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和中外历史知识还缺乏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对历史的学习。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通过学习历史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大为提高，使自己的领导工作水平不断得以提升。

二、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

古老的中华文明早已闻名于世，它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几千年来，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所处的岗位职责不同，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会有不同的具体需求，但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的道理都应该懂得，都应该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自觉地学习历史。

我们要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曾受过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威胁，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王朝更替、外部入侵等等，但中华民族却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究其内在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产生和形成了为整个民族共同认可、普遍接受而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优良传统。比如崇尚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在对待民族、邦国的关系上，倡导以“协和万邦”即和平共处为邦交原则，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之间有矛

盾冲突更有交流融合，在冲突和融合中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民族关系的主流。从先秦到秦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千百年的交流融合，使得各民族难分难解，终于形成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团结进步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又比如维护国家统一的优良传统。历代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春秋时期，孔子修订《春秋》，包含“大一统”思想。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流。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再比如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先哲很早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古代神话中流传的“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孔子倡导的“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汉使苏武的饮雪吞毡，以及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赋《离骚》、司马迁忍辱而作《史记》等等，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就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

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丰富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经验智慧；既有当事者对时势的分析陈述，也有后人对前人得失的评论总结。可以说，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学习历史，要结合我们正在干的事业和正在做的事情，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比如，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主张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治手段并用。法是他律，德是自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规划。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又比如，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人才问题。他们深深懂得“为政之道，任人为先”的道理，在选人用人方面留下了很多可取的思想经验和经验，诸如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才兼文武、德才兼备，敬贤敬能、礼贤下士，访求俊彦、唯贤是举，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避其所短、用其所长，勤于教养、百年树人等等。还有孟子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韩非子说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其意是说优秀的治国理政人才，必须经过艰苦条件的磨炼，必须具有起于社会基层的实际经验，这些认识都说明了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我们强调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树立重视基层的导向，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注重选拔长期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优秀干部，这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有历史经验的借鉴。再比如，我国历史上经过科举制等途径，探索出了把人才的培养与任用分为两类：通才与专才。在治国理政中，通才任用于政务工作方面，专才则任用于事务工作方面。人才的培养任用应该分为政务、事务两大类，并且应有不同的标准、要求和职责，培养、选拔的途径和任用、考核的办法也应不同。这个选人用人的历史经验，今天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我们要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历经磨难而不衰的中华文明，蕴涵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诸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顽强意志，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执着追求，等等。在我国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先贤和仁人志士都对高尚的精神追求作出了阐释。诸如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的“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等等。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一代一代众多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中，从中华民族传诵千古的诗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精神、高尚的社会风尚以及那些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我们学习历史，就要学习和吸取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用“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我们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我们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这三句话，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了近现代中国170多年的历史，高屋建瓴、要言不烦，为我们学习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基本线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苦难史。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和欺凌过中国。他们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一系列军事侵略，制造众多惨案，屠杀中国人民；他们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贸易、交通运输等主权；他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租界，强行驻军，扶植和收买代理人，培植亲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中国政府；他们勒索赔款，抢劫财富，盗窃文物，控制交通口岸，对华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

重破坏。中国遭受如此欺凌，陷入如此境况，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就要了解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历史，深刻汲取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的教训，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制造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觉醒，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为改变中华民族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国家和民族不断燃起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斗争的崭新阶段。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奋起革命，前仆后继，竭尽全力，不愧为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蓬勃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浴血奋斗的抗日战争和气势磅礴的人民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并适时地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领导人民进入了实行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我们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目的是为了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前辈共产党人建树的优良革命传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

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个历史任务相互衔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那么，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必须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必须由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来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才能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主张争论和较量的实质，是不同的历史道路、社会发展方向之争。实践证明，封建官僚们进行的所谓自强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

的民主革命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先后在近代中国一一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从近代中国波澜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不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根基的改良主义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种方案尝试全部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其他各种政治力量都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解放与复兴，唯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才使受尽屈辱、濒临危亡边缘的中国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才向世人彰显和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真理。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就要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煌。90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境遇，不可逆转地开启了当代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我们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起来说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其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伟大辉煌，其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也世所罕见。90年来，我们党经历并一一有效应对的困难、风险很多。比如：有效应对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极大危险，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

的大好局面；有效应对了 1934 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严重困难，经过长征北上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有效应对了 1959 年至 1961 年这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有效应对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局面，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效应对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强烈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夺取了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重大胜利；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所造成的困难，继续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等等。遇到困难和风险，勇敢正视、正确应对，攻坚克难、夺取胜利，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遇变不惊、知难而进、化险为夷、百折不回的奋斗历程，这也是我们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所以能够不为一切困难所吓倒、不为一切风险所征服，而终能不断地开创出一个又一个胜利局面、不断地推动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党 90 年来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三件大事、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之所以震古烁今，正是因为它们来之不易。其中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有困难、有风险、有危机、有曲折，都不可怕，关键在于要勇于面对，善于克服和战胜它们。一旦战胜了，就会峰回路转，光明在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从经历和战胜各种困难与风险中来历练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力量的。所以，我们学习党的历史，认识党的光荣伟大，不仅要充分认识她带领人民取得了光荣伟大的业绩，而且要充分认识她带领人民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中披荆斩棘、不断开辟胜利道路所展示出来的巨大勇气、巨大智慧和巨大力量。

领导干部在学习我国历史的同时，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明朝末年，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近代更是陷入了列强欺凌、被动挨打的境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看不到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其他先进的东西。封闭必然落后，落后

就要挨打，教训是深刻的。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代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处理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还是处理对外开放中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放眼世界，具有宽阔的眼光。只有既从现实又从历史两个方面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才能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对外工作做得更好。

最后，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能读死书，要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对所读之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才能在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发挥历史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

今天我就讲这些。祝同志们在校学习取得丰硕成果。

（本文是习近平同志 2011 年 9 月 1 日在中央党校 2011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刊载于《学习时报》2011 年 9 月 5 日第一、五版）

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

李源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生命之本、力量之源、执政之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今天，我着重就领导机关的干部要“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讲点意见。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在人民的养育和支持下发展壮大的。始终与人民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优势和鲜明特征。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靠的是老百姓不惜牺牲生命支援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靠的是从革命领袖到普通党员都与人民群众一块吃苦，“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当时延安党群关系的生动写照。解放战争中，我们能以那么差的武器装备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靠的也是人民支持。“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谆谆告诫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总书记都反复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永远不能丢。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的人民群众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坚定地站在一起的。但在我们的一些机关和部门，脱离群众的现象确实还普遍存在。由于有的干部习惯于坐在机关大楼里看材料、听汇报，有的干部既缺乏对百姓困难设身处地的感受，又缺乏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经验，有的干部忙于开会、发文件，而不知道工作在基层落实的效果，因此，在这些机关

和部门存在着不了解群众情况、不明白群众意愿、不理解群众态度的倾向，这使我们许多工作部署有阻力，许多政策效果打折扣，许多实际矛盾不能及时解决。长此以往，领导机关的决策和工作就会脱离基层实际、违背群众意愿，我们党就会有失去群众信任和支持的危险。有效化解这个危险的办法，就是普遍地动员领导机关的干部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

领导机关的干部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首先要到基层去。只有在基层，干部才能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才能摸到群众的脉搏，贴近群众的心窝。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下基层活动，取得明显成效。重庆每年组织20多万机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广东、江苏、浙江、湖北、安徽、陕西、山西、吉林、云南、新疆等省区都是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带头，大规模选派干部住村蹲点调研。群众称赞，“当年干部的好作风又回来了”。许多干部下去后，亲身体会老百姓生产生活之艰辛，心灵受到很大震动。山西一位副省长在住村日记中写到，自己过去也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通过住村调研，才真切感受到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缓慢的现状。他的住村日记发表后，引起网上一片好评。我们中组部有位抓农村党建的副局长，已经参与指导过4届乡镇党委换届工作，但都未亲身经历过一个完整的乡镇换届过程。这次乡镇党委换届，他在试点乡镇蹲点一个月，直接在基层参与了换届的全过程。他说，现在抓乡镇换届才真正感到底气足了。这些情况说明，技术再发达、信息再通畅、交通再便利，都代替不了干部住村入户、蹲点调研。因此，领导机关的干部要自觉走出大楼，沉到农村、企业、社区去，尤其要到艰苦偏远的地方去，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越是到这些地方去，你越能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越能体验群众的酸甜苦辣，越能知道自己工作的利弊得失。

领导机关的干部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必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一要了解实情，掌握第一手材料。二要研究实招，总结基层创造的经验，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三要检验实效，看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是否符合基层实际，有没有给群众带来实惠。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系列突破性的改革举措都来自基层和群众的创造。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些年，我们大力推行的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农村党支部书记“一定三有”政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选聘大学生村官，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等等，都是总结各地基层的实践经验形成的。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期和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机遇前所未有，矛盾和困难也前所未有。人民群众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力量，是破解各种难题的根本依靠。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真正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

领导机关的干部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最重要的是培养起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孔繁森、杨善洲、沈浩等党的优秀干部之所以能一心为民，把个人的一切都奉献给党的事业，就是因为他们真正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对群众怀有赤子之情。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在一起摸爬滚打中产生的。现在，领导机关中有不少干部特别是年轻同志，从大学门直接进机关门，没有经历过基层艰苦工作的磨练，缺少对普通群众生活的切身体验，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加大领导机关脱离基层、脱离群众的危险。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方面，推动领导机关年轻干部到基层交流任职，补上缺乏基层经历这一课。一方面，中央和省级机关逐步减少直接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招录公务员的比例，而从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学生中选录公务员。与此同时，必须系统地组织中央和省级机关的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群众中去进行深入的投资走访，增加对普通群众的直接了解。最近，中组部已分批将近百名中央机关局级年轻干部派往市县锻炼。农业部组织机关全体年轻干部走千村进万家，调研农村工作现状，受到下基层干部和基层群众一致好评。这样做，

目的就是为了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深刻领会中央的战略考虑，自觉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和基层一线去，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在应对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秋季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专门就领导干部要学习党的历史作了重要讲话。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生动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的宝贵资源。三所干部学院要充分挖掘和运用这些精神财富，按照党在新时期建设和干部成长的需要，用党的历史上战胜困难、取得成功、保持活力的宝贵经验，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做一个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受人民群众信赖的好干部。

（本文是李源潮同志 2011 年 9 月 5 日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2011 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刊载于《学习时报》2011 年 9 月 12 日第一版）

责任编辑：曾乐元

校 对：闫 妍

联系电话：82334050